

壹、研究方法與進度說明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用三種研究方法，分述如下：

(一) 文件分析法

歷年的官方課程改革文件、重要的民間教育宣告、影響教育改革的政經事件及其文件等等

(二) 訪談法

訪談法將涵蓋教育與課程改革專家，以期理解理念課程與正式課程的發展脈絡；此外，亦將訪談瞭解六大社會趨勢的專家，期能正確掌握變遷趨勢與影響。

(三) 焦點團體座談

安排北中南中四區各一場，包含小學、國中、與高中職教育人員。

二、研究進度

本研究已完成研究的文獻探討，並得出研究的成果。文件分析將繼續，而訪談與分區焦點團體座談將陸續開展與完成（表 6-1）。

表 6-1 研究進度圖

	98/1	98/2	98/3	98/4	98/5	98/6	98/7	98/8	98/9	98/10	98/11	98/12
擬定研究架構												
閱讀與整理文獻												
課程綱要與官方文件分析												
專家諮詢與訪談												
資料的彙整、反省與再閱讀												
研究報告初稿的完成												
結案並繳交研究報告												

貳、蒐集之資料與文獻分析

一、研究背景、目的與重要性

教育是任何社會中的一個重要層面或系統，影響所及教育與社會的關係也就

密不可分。Dewey 指出，學校是社會的縮影。林清江（1987）也強調：社會變遷的事實影響教育的內容與方法，而長期的教育效果也會促成社會的變遷。可見，健全的課程改革與規劃，必須考量所在的社會脈絡，掌握社會發展與變遷的趨勢。課程是不斷發展的過程，而課程的發展若缺乏深刻的理論基礎來作為改革的原則與理念，不僅不易成功，也往往流於枝微末節的增刪修改。回顧我國近十年來的課程改革，最重要的便屬 2000 年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2003 年以後逐漸又被強調的十二年國教、以及，2006 年的高中職綜高 95 課程暫綱與 98/99 年正綱的變革。從歷年的改革規劃與實施中也發現，所謂的十二年國教，是以「後期中等教育」的部分為規劃的重點，而並非以十二年整體為思考著眼的脈絡。不管是延長之職業教育、綜合高中、免試入學、高中職多元入學方案、高中職社區化方案…等等，均是屬於後期中等教育階段的教育改革。技藝教育方案雖是國中階段的改革策略，但不僅規模較小、較不受重視，就內涵上來講，也缺乏國高中的一貫聯繫。至少在 2003 年的全國教育發展會議之前，十二年國民教育的政策，便不是從「5-18 歲的國民教育」此一宏觀的角度來規劃的。再者，我國高中 95 暫綱課程政策的改革，其主要的影響因素，一方面受國民義務教育年限延長的影響，另外也與國內經濟條件的改善，職業市場結構改變以及知識經濟社會之需求有關。高中課程改革面臨許多挑戰，如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的縱向銜接、課程時數與科目數的爭論、學校類型多樣化的橫向統整、課程結構延後分化的調整、基礎學科能力的重視等等。這些課程改革的政策，反映了前述後期中等教育在課程政策擬定上的複雜性與模糊性。

可見，從台灣新課程綱要發佈時論述轉變的過程來看，由於提供這些學科發展所需的立論基礎與政策脈絡缺乏，後來對於課程改革論述的爭辯，不僅對於課程的討論也只集中在課程內容多寡與時數問題，以及其他如師資研習與升學考試等應該是屬於實務執行階段處理的問題，也使得原本希冀隨時代變遷調整高中菁英色彩轉為大眾教育特色的重視試探功能的「延後分流」之課程改革政策，卻轉而簡化為『科目簡併』與『減少必修學分』的科目與時數微調的「雷聲大雨點小」之課程政策。也難怪學者們認為高中 95 課程暫綱缺乏明確的立論基礎。黃炳煌、葉麗君（2005）認為台灣的高中課程改革「缺乏明顯的哲學基礎，並且不能從高中的定位出發，架構整體的課程架構，也沒有思考六年中學的銜接問題，甚或十二年一貫的銜接問題，以及高中職級綜合高中課程統整的問題」。潘慧玲（2005）

亦指出「課程修定欠缺立論基礎，無法凸顯改革特色」，認為我國歷年的課程改革多淪於科目時數爭奪戰，而課程的立論基礎未加以釐清。

因此，台灣課程的改革強烈地顯現了「課程改革需要深刻的社會反省，以為改革的基礎」此一論述。這一反省也呼應了自 1960 年代以來，課程研究的發展已逐漸懷疑傳統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研究典範的適切性，因而由注重實務改進的技術模式，走向較為完備理論系統的建立。換言之，是從影響課程發展的諸多因素的系統研究，轉而注重課程本質和其基本問題的解析，例如，知識選擇、分配和評鑑與社會權力結構、意識型態的關係（陳伯璋，1987：15）。在此一發展中，教育知識社會學的研究，不僅動搖了向來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學校知識（課程）之合法性，更對教育內容的選擇、組織、及其背後的意識型態多所批判。就社會變遷對於課程內涵之影響而言，任何課程定義中都蘊含著某種知識概念，而獲得這些知識乃被假定為是學習者適應未來社會所必要的（Young, 2000: 108）。Lawton (1973) 在《社會變遷、教育理論與課程規劃（Social change, educational theory and curriculum planning）》一書指出：課程與教學的內容受到哲學、社會學與心理學三個層面的因素所影響；哲學的理念為知識的結構與組織，社會學的面向為知識社會學，心理學因素則與兒童發展與教學理論有關。而其中社會學的面向，即需處理社會結構及其變遷對教育與課程的影響。Hass (1983) 則建議課程設計人員應注意當前的社會變遷問題，如環境、能源危機、道德和價值的變遷、家庭、都市與郊區的危機、平等的權利、犯罪與暴力、疏離與焦慮、國際緊張等。Beane et al (1986) 也認為，社會趨勢與問題應該是課程計畫人員注意的重要面向，包括：科技、家庭結構、資訊社會、性別角色的改變、文化歧異和多元文化論、生活方式和價值的改變、轉型的社會

此一論點呼應了 Young 在過去十年來不斷呼籲的「未來的課程（the curriculum of the future）」的概念（Young, 1998, 1999），他認為，為未來所設課程的計畫的課程藍圖，必然預設了一個未來社會的輪廓。對未來社會的形貌有不同的想像，當然會導致出不同的課程規劃，影響所及，對課程中應該要包含哪些知識作為內涵，也就有不同的見解。如果一味地只強調學歷證書的獲取與頒發，而不探索未來社會與經濟的特色，那麼，有沒有可能獲得學歷的人愈來愈多，但學習者所學到的，未必是他們在未來的社會與經濟生活中所需要的呢？例如，過去三十年來全球經濟的轉型與「新經濟」的興起已強烈地挑戰此一傳統假設，並進

而影響後期中等教育的基本架構。事實上，包括台灣在內的世界大多數國家，都已陸續進行後期中等教育的改革。主要的幾個改革的重點包括：加強職業教育、延長職業教育的修業年限、改革普通教育加強職業取向的科目、彈性的學程與進路、加強課程中對科技的理解與學習等等（OECD, 1990: 61; OECD, 2000）。因此，課程改革的基礎必須探討改革脈絡中的社會議題，特別是社會變遷所造成對課程改革的衝擊。本研究也希望以此為探討的重點，希望在縱向上，兼顧國民中小學以及高中職階段，涵蓋高等教育以前的初等教育與中等教育；在橫向上，能從課程社會學的角度，探討影響課程發展的社會脈絡與變遷因素。尤其是，本研究希望從全球化所帶來的經濟轉型與社會變革，來探討全球化所帶來對課程內涵與重點之衝擊，並據以反省我國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的理念與精神，以期探討理念與實踐的辯證過程，更期望得以瞭解促成課程改革的重要關鍵因素。

二、全球化與社會變遷

全球化不是一個新的概念，甚至可以溯及十五世紀，在現代性與現代資本主義興起之前。不過，全球的意識、全球化現象的物質展現，卻是二十世紀中葉以後有較為明顯的展現（Dale & Robertson, 2002）。Harvey 則指出，全球化促成了時空的壓縮，使得人們對時間與空間的經驗不僅和過去大不相同，更強化了緊密依存的全球村的感受（Porter & Vidovich, 2000）。Waters (2002: 22) 更主張，全球化的發展，已經在各領域都產生重大的影響，包括：經濟、政治、與文化等：

- * 經濟朝向市場化，亦即自由化是從命令、限制和地位與階級中解放。
- * 政治傾向於自由化和民主化，也就是權力的分散
- * 文化朝向普遍化，抽象的價值和標準到達非常高度的普遍性，將容許文化極度分殊化。

李子建、林嘉嘉（2006: 195）則整理相關文獻，舉出全球化的趨勢與面向，主要有下列五項：

- (1) 政治的全球化：涉及民主價值的全球傳播，愈趨頻繁的國際互動，如聯合國等國際組織、跨國集團與區域聯盟等；

- (2) 社會的全球化：由於資金、資訊、人才的流通都是全球性的，導致競爭也是跨國性，職業績效的壓力擴大、學習的迫切提高...等等；
- (3) 科技的全球化：隨著網際網路的不斷更新與進步，資訊已能全球性地流通與散布；
- (4) 經濟的全球化：市場的開放、資金的全球性流動，進一步促成跨國性公司的全球性運作，影響全球的經濟活動；
- (5) 文化的全球性：拜資訊流通與大眾運輸的便利性大幅提高與成本降低，地球村的概念愈趨真實，全球各地的文化互相影響，也促成共通特性的發展。

誠如上述，全球化的影響不僅是各方面的，其影響的程度與深度，也日愈加速。例如，尤其是 1990 年以後受網際網路普及的影響 (Castells, 2000)，全球化的趨勢已經愈來愈明顯，快速地造成階層的扁平化，不僅「地球是平的 (The World is Flat)」，也促成了全球各地的「個人 (individuals)」有更快速而平等的機會與競爭。亦即所謂從全球化 2.0 的跨國公司競爭，進入到另一個新的局面，亦即全球化 3.0 的個人的競爭 (Friedman, 2007)。

(一) 不斷的科技創新

科技的不斷創新，在經濟的轉型中扮演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自 1970 年代以來，電腦與通訊方面陸續有劃時代的發明，由於新科技的應用相當廣泛，其對經濟的影響也愈來愈明顯(Castells, 2000:39; Hutton & Giddens, 2000:20)。電腦化是科技進步中最重要的項目之一。電腦的使用使得原本功能單純的機器，能結合資訊處理、記憶儲存和程式化(programming)的功能。藉此，機器就能夠彈性依照市場的需要，在生產的方式上做快速而機動的調整(Mathews, 1989:41)。例如：在 1980 年代早期，通用汽車(GM)得花九個小時來更換生產線上汽車染料的顏色，而同樣的步驟，在 1990 年代的豐田汽車(Toyota)工廠裡，只需要兩分鐘。由於電腦自動化所帶來的這種優點，使各類工廠可以不必再製造單一而標準化的產品，而可以讓產品多樣化。製造業之外，如金融、零售、醫療、辦公室文書等等，也深深受到電腦自動化的影響。最新的網路科技，進一步把過去各自獨立的資訊處理媒介結合在一起，使得「隨時隨地的資訊處理(pervasive computing)」成為可能，讓使用者得以透過各種不同的工具與媒介，從不同的地點連上網路，進行資訊的處理(Castells, 2000:51)。

另一類重大的科技創新是通訊科技。衛星、光纖、電子郵件、與全球網路已經透過其低廉的價格與高速的資料傳輸，徹底地改變了人們溝通的方式(Hutton & Giddens, 2000:1, 20)。新的通訊科技讓資訊在全球各地的傳播更為容易且快速。文件可以被複製與傳播，而幾乎不需要增加任何成本。全球的資金現在可以在幾秒鐘之內，在不同的經濟體之間流通。這種相互連結所構成的全球資本市場，乃是經濟全球化中最重要的特色之一(Castells, 2000:52, 101)。

上述這些科技面的創新，已經導致了 Castells 所說的「微形工程—巨大轉變(micro-engineering macro-change)」(Castelles, 2000:39)。過去。科技總被認為只與某些特定的行業有關，現在，科技則深入各行業的各階層。Pont & Werquin (2001)也認為，科技不僅是改變全球溝通與經濟的主要因素，而且根本就是每個人日常生活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這種普及性，使得科技對經濟的影響更為全面，也更為深遠。例如：傳統製造業所需要的勞動力持續下降，而對經理、專業、科技方面人才的需要，則不斷增加(Castells, 2000:244)。過去使用機器的操作員，逐漸被更高階的技工或懂得運用資訊的人才所取代。彈性的製造過程意味著，現代的經濟生產能夠快速、小量、彈性應變。新的科技使得彈性生產過程中所需要的複雜的互動變得可能，並充分地利用這樣的互動所醞釀出來的創造力。無怪乎，Castells 認為，新的資訊科技已經成為更彈性、更相互聯繫、更為網狀連結的社會(flexible, interconnected and networked society)中，不可或缺的物質基礎(Castells, 2000:70)

(二) 全面資訊化社會

1970 年代以來，紛紛有學者指出，「知識」在塑造工作本質、職業結構、經濟與社會方面，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知識的重要，表現在新科技的發展或是各類的資訊處理過程，這樣的特色，使得知識成為後工業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或是資訊化社會(informational society)中最重要的特徵(Bell, 1973, 1980; Castells, 1989, 2000; Touraine, 1971; Allen, 1992)。

例如，Bell 便曾論述：知識及其運用，不僅只是用以產生利潤的資源(resource)，而且逐漸成為可以在市場上買賣的商品(commodity)(Bell, 1973)。Bell 認為，資訊處理已影響經濟的各個層面，也改變了我們做事的方法，使得愈來愈多行業變成以生產、處理、傳播知識的「資訊行業(information occupations)」(Bell, 1980)。例如：經理、專業、科技類的行業在經濟體系中所佔的比例便愈來愈重。

Castells (1989) 則強調經濟的發展正從工業化的模式(industrial mode)朝資訊化的模式(informational mode)轉型。1970 年代以來的科技創新，已經匯流成一個新的典範。這個典範強調資訊處理對生產、消費、流通、管理各層面都造成根本的影響。資訊或知識一方面已成為各類科技發展最重要的輸入因素，另一方面，也是科技的產品。因此，成為新經濟中各種產品、服務、決定、流程的關鍵因素(Castells, 1989:28-30)。

(三) 全球化社會變遷

誠如上述，全球化的趨勢造成的影響是各層面的，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自然環境...等等。其中，可大略歸納為兩大面向：經濟的趨勢與知識經濟的衝擊；其二，社會趨勢與全球的在地化。前者指科技進步所促成的資金與人才流動，影響的全球經濟與職業型態的變遷，後者，則泛指社會、文化受到全球化的衝擊與因應。

首先，全球化造成經濟轉型的趨勢非常明顯。例如：許多新興的工業國家以低廉的勞動力為競爭優勢，迅速進入全球的經濟體系。相對的，工業先進國家中，技術能力要求較低的勞動市場則持續萎縮。就高級人力市場而言，全球性的競爭也很明顯。例如，企業現在更能夠以在世界各地尋求更專門、更優秀的人才，因此，先進國家中高級人力市場，已經開始受到許多「後起之秀」國家的影響。比如說，印度以素質高的軟體工程師著稱，而台灣則以製造半導體與個人電腦的靈活快速聞名。兩者都在美國矽谷的高科技業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Castells, 2000:129)。

其次，全球化造成的社會轉型也值得注意。個人化的競爭已經以全球為舞台，不僅是國與國之間實際的遷徙更為方便與頻繁，更透過更便捷的網際網路從事「外包 (outsourcing)」，使得所謂國際間的競爭，乃成了個人之間的競爭更為彈性也更為激烈。在此一競爭平台上，所謂的人才所需具備的視野將不相同，兼具本土與全球觀視野的全面性人才，將更具有競爭力。然而，未能具備足夠素養的人，將成為經濟與社會的邊陲，必須加以關照。

三、經濟趨勢與知識經濟

(一) 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發展

加速的全球化是經濟轉型中最重要的走向之一。拜通訊與運輸工具的進步與普及，貨品、資金、勞力、服務、知識、資訊等等，現在的流通規模都是全球性的。值此之故，製造、貿易、金融等生產要素都以國際性的網路來組織運用，以期降低成本、擴大市場、並獲致最佳的經濟利益(McGrew, 1992:79; Castells, 2000)。這樣的全球經濟運作，加速了全球性的分工，大公司不僅能將大量的資金在不同的經濟體之間，靈活而快速地週轉，也更能將部分的生產移至海外的據點，以增進整體效益(Allen, 1992:189)。於是，不同公司與不同國家之間的競爭，便變得更為激烈。此外，全球化的市場，意味著更多不同族群的消費者，更多不同的喜好偏愛，因而對產品多樣化的要求愈來愈高。過去單一而標準化的生產模式，已無法符合消費者的需要。

(二) 分工模式的轉變

傳統福特主義(Fordism)的典型是 Marx Weber 所描繪的官僚體系(bureaucracy)，致力將各種工作分化以求專精，重視的是由上而下的管理結構。廣大的勞動力人群主要透過層層的管理階層、以及分殊的部門來加以協調，彼此之間，再構成一個巨大的金字塔型結構。組織的任務，乃是在履行一個事先已經預為規劃的程序，各部門均需遵守著此一嚴格的規範(Cheng, 2007, Young, 1998)。

但科技進步已經使得此一結構嚴謹的分工方式陸續受到挑戰(Brown & Lauder, 1999)。Piore & Sabel (1984) 強調傳統的分工方式，已經無法因應新的生產方式，太過於強調特定專長的能力，反而無法關照全局。Piore & Sabel(1984)指出，新的生產體系中重視的是彈性專長(flexible specialization)，例如，設計者要能具有多項專長(broadly qualified)，而生產的勞工也要能具備多項技能(broadly skilled)，或是如 Young (1998) 所提出的關連性的專長(connective specialization)。

(三) 經濟轉型與職業結構的改變

「新經濟」的出現可以追溯到 1970 年代後工業社會的興起(Bell, 1973)，以及微電子科技的突破與廣佈(Castells, 2000: 39)，尤其 1980 年代後期，全球

性金融市場的壯大（Castells, 2000:53）更突顯新經濟的到來。尤其新經濟具有的科技化、全球化、資訊化三項特徵，並進而分析傳統的分工架構所遇到的瓶頸。新經濟興起強調服務業重要性，相對之下，農業與製造業雖然存在，但其勞力密集的特性，已經使得大多數的工作已經被自動化設備與資訊科技為主的機器所取代。Levy & Murnane (2007) 便指出，愈容易被程式化（programming）的工作愈容易被取代，因此具規則性的工作、具模式型態的工作、以及純粹的識別性工作當中，前兩種都將被機器或資訊處理所取代，僅剩下電腦無法取代的第三類工作，才是人力訊息處理的價值。

（四）小結

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之下，知識經濟的發展與趨勢愈來愈明顯，知識工作者的特質與對知能的要求愈來愈高，促使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的必要性、資訊應用與學習探索（key competence）愈加明顯。如何因應此一趨勢而有教育上的改革，乃是未來課程的重要課題。

四、社會趨勢與全球在地化

新的資訊科技促使全球各地的互動更為密切，整合成個巨大的「全球網絡（global networks）」或虛擬社群（virtual communities）（Castells, 2000:22）。但這樣的全球性不僅是在經濟面促成資本的流動，更進一步在社會面形成衝擊。

（一）全球化趨勢下的個人角色

有別於最初的全球化發展是以國家及其武力的擴張，而十九世紀以後全球化發展的主要動力，乃是跨國性的公司；最新階段的全球性發展，亦即所謂 3.0 版的全球化，乃是以個人為主要的動力。最主要的特徵乃是在此一階段中，個人將能夠在扁平化了的全球性平台中，進行合作與競爭（Friedman, 2007: 10）。

由於網路科技的進步，加上全球化趨勢的發展，不僅操作性、規律性的工作逐漸被取代，甚至任何可以被「數位化（digitized）」的事務，都有可能被外包（outsourced）至任何全球各地，或是為了更廉價的成本，抑或是為了更高的品質。換句話說，全球化的發展，促成了一個全球人才競爭的平台，各地的人才可以跨越地理與國家的疆界，不必出國也可以互相競爭，機會更多，但競爭也更激烈（Friedman, 2007, Levy & Murnane, 2007）。Friedman (2007) 更指出，價值鍊

上任何可以被拆解的部分，都將因此可以被扁平化的全球各地的人力所爭取，也因此，個人的價值，乃將只剩下個人所能貢獻的附加價值（value-added）的部分。全球化的發展創造了一個全球競爭的互動平台，也因而凸顯了個人的重要性。而個人是否有此一平台可以利用？是否有能力利用？又是否能在此一廣闊的競爭平台上與全球性各地的優秀人力競爭？都是攸關個人發展與生存的重要課題。

（二）全球化社會造成的人才流動與多元文化

全球化的經濟與政治活動，促進了人才的全球性活動；而拜網路資訊的發達，更多的訊息都可以從網路上獲得，也擴大了個人的視野，增加個人對其他國家的瞭解。但在此一地球村中，如何與他人互動？應該具備何種人際素養？則顯然有別於傳統以國家與區域為範疇的概念，而必須有全球性的視野。

因此，全球化的發展促進了不同文化之間的理解，所謂的多元文化，將不再只是討論國內原有的歷史脈絡中所存在既有不同族群的問題，亦更因全球化的交通與運輸方便，國與國之間的交流與互動頻繁，尤其因為跨國性企業的影響，個人將愈來愈需要全球觀的建立（Mansilla & Gardner, 2007），並藉此培養全球公民素養（global citizenship），將有助於全球性個人與個人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互動。

（三）全球化與全球在地化

由於交通與傳播科技的進步，全球各地的互動已經都可以「真實時間（real time）」來進行，最顯著的例子是資金的流動，股匯市的進行幾乎都已經沒有因為地域所造成的時間差。而人口的流動頻繁、加上資訊的流通更為便利，造成所謂的國界的疆域不再是阻隔，更衝擊所謂民族國家的概念，與國家政府的角色，使得認同（identity）的問題愈形重要（Castells, 2000:22）。

然而，全球化的發展也未必便是犧牲在地化的特色。相反地，全球化的發展也給個人與社會一個絕佳的契機，可以利用各種便宜的網路科技，上傳（uploading）在地化的資訊，在全球化的平台上無遠弗屆地傳播。這便是 Friedman (2007: 477) 所稱的「在地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the local）」。換句話說，區域性的特色不僅不會被犧牲，反而會因為全球化的發展，找到各地潛在的閱聽讀者或相同文化背景的人，而得以保留甚至擴大。

因此，全球化的發展未必是犧牲在地化的特色，也未必是忽略了在地的人文

特質與文化特色。相反地，全球意識（global consciousness）的培養，讓個人在既有的文化基礎上，得以肯定在地，關照全球，才是全球化與在地化雙贏的局面。

（四）小結

綜上所述，全球化所帶來的科技進步與扁平化的社會，不僅凸顯個人角色的重要性，也凸顯所謂的人才競爭，必須從全球競爭的角度，看是否能從此一資訊平台中獲得學習的資源，而導向知識與技能的擴展。前者與「以學習者為導向的課程（Learning-based curriculum）」有關；而後者，則必須對學校的概念重新界定，論及「學校教育的再概念化（Re-schooling and equal opportunities of education）」並在此基礎上再思考教育機會均等的新時代意涵。

參、研究研究發現

本研究基於研究的文獻探討，已歸納出重要的趨勢與發現。下文中，先敘明四項因應全球化變遷的課程改革，再討論現有課程綱要的適切性。

一、因應全球化變遷的課程改革

教育是社會體系的一部份，社會變遷的各個面向，也會影響教育的運作，因此，課程設計人員不可避免地必須關照到社會變遷的面向，以期主動調適或被動因應社會變遷所帶來的衝擊（Hass, 1983; Beane, 1986）。

Smith (2003) 則分析教育受到全球化的影響，主要顯現在下述三個層面：

首先，教育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之影響日趨顯著，主要將教育視為一種商業活動、強調成果或成品為本的測量、重視表現與指標、重視人力資本資源（human capital resource）的概念，此外，公立學校的成效飽受批評。

其次，因全球化的經濟與社會變遷，導致教育的內涵與方式有所調整。如，因應跨國性公司的愈趨普及，新加坡政府強調培訓國民以便進入這些跨國性公司，也在課程中強調新的國際語言（如德語）；日本則注重學習應配合生活的需要，開設課程鼓勵學生充實基本技能。

第三，教育逐漸納入全球化趨勢所帶動的新的論述與人類永續未來的全球性對話。

受到上述全球化社會變遷的影響，下述教育理念愈來愈受到重視，如：終身